

# 文化班学员作文选

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 文史教研室 文化班办公室 选编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## 目 录

### 记 叙 文

- 里迷藏 ..... 张庆黎 ( 1 )  
一张照片 ..... 刘汉武 ( 9 )  
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..... 赵洪祝 ( 14 )  
下放前夕 ..... 赵正夫 ( 17 )  
列车里的新风 ..... 马怀西 ( 20 )  
我们的组长 ..... 王安泽 ( 22 )  
一朵闪亮的烛光 ..... 王银娥 ( 27 )  
写 字 ..... 瞿 勇 ( 29 )

### 议 论 文

- 裁花与摘刺 ..... 徐衍东 ( 32 )  
熟悉改革，参与改革，保护改革 ..... 谢 勇 ( 35 )  
改革价格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..... 张拊等 ( 40 )  
破除陈旧观念，大胆起用人才 ..... 刘汉武 ( 43 )  
“ 加温 ” 议 ..... 王东庆 ( 51 )

- 改革与用人——从《关于打狗的九次会议》谈起……胥仕中 (55)
- 戒应景……………赵正夫 (59)
- 话说“清道夫”……………瞿 勇 (61)
- 深入进行农业改革……………王安泽 (64)
-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……………斯建辉 (69)
- 改革是形势发展的需要……………刀光亮 (72)
- 机关建立岗位责任制势在必行……………王淑芳 (76)
- 改革对共产党员的要求……………东堆朗杰 (79)
- 要重视思想上的“松绑”……………毛治雄 (83)
- 逆境奋斗唯志坚……………唐宪脂 (86)
- 把握大局，方能从“难”到“活”
- 谈谈在改革中如何开展团的工作……………刘春伟 (89)

### 调查报告·工作研究

- 关于三峡移民工程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和建议……唐章锦 (93)
- 北京电视机厂是怎样用较少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发挥较大经济效益的……………王 凯 (100)
- 森林资源濒临枯竭，调减产量迫在眉睫——
- 关于伊春林区森林资源消耗情况的调查……………徐衍东 (107)

(2)

- 改革计划经济管理机构的尝试——四川省  
计划经济委员会机构改革的情况调查 ..... 扎 舍 ( 118 )
- 实行社会化专业服务是农村用经济手段管理  
经济的一种好形式——内蒙古临河市黄  
羊乡农工商联合服务公司的调查 ..... 傅守正 ( 122 )
- 经济联合是供销社活跃农村经济的必由之  
路——山西省长子县晋义供销社的调查 ..... 张官娥 ( 128 )
- 关于农村私人承包社队企业和联合新办企  
业情况的调查 ..... 郭荣昌 ( 138 )
- 合肥纺织行业出路何在 ..... 韩翠英 ( 145 )
- 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有效途径——一个家庭  
机械化农场的调查 ..... 赵洪祝 ( 147 )
- 太原市蔬菜公司鼓楼商店是怎样实现经营  
责任制的 ..... 范玲秀 ( 153 )
- 一个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翻身的企业——  
焦作市化工二厂的调查 ..... 谷渭显 ( 159 )

开发农村青年智力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——

河南省永城等县试办农民技术学校情况的调查……刘春伟(168)

一个落后村是怎样变成了名扬全省的精神文明

村的…………………翟恩惠(175)

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干部教育情况…………王文光(181)

川菜出口 大有可为…………………陈忠良(187)

联合经营前途广 科学养鸡效益高…………王学远(192)

山城子公社实行党员“联户”制度的调查报告……程盛中(197)

## 里 迷 痴

北京学员 张庆黎

春节前，我回山东老家探亲。不知为什么，汽车一驶入我们县境，我心里就很不平静，大约离开家乡时间长了的人，都有这种心情。

汽车在笔直的公路上奔驰着。眼下虽然已是隆冬季节，但沿途的风景却分外壮观。五年前的土公路现在全部铺上了柏油面，路两旁还栽上了整整齐齐的白杨树；过去高低不平的老旱地，如今已全部变成了平展展的水浇田；沿途的村庄，也大都盖上了青石到顶的新式房……。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村张徐庄的情况：记得七八年我离开家乡时，它还是全县有名的落后队，现在五年过去了，有没有变化？像三队“里迷痴”徐光廷大伯那样的人，是不是还是老样子？……

汽车在飞驰着，我脑子里也在思考着。不知不觉到了站了，我在村北头刚一下车，只见百十米开外的西山岗下围着一大群人。隐隐约约还听到吵嘴的声音。我正想前去看个明白，忽听到一个小男孩大声喊道：“‘里迷痴’大爷爷和人家吵嘴了！”

一听“里迷痴”这三个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没想到这位大伯的老脾气还没改！我边走着，脑子里就断断续续地浮起了一些“里迷痴”的往事……

“里迷痴”是我们家乡的土话，是对无巧不成，无利不沾，为了自己不吃亏，有时简直像发了疯似的人的形象说法。徐大伯

为什么得了这么个“雅号”呢？说来话长了。这人有点小聪明，什么事情都比别人盘算的周到，干什么总想沾点光。单干时，他经常和邻居争地边；入社后，他经常损公肥私捞外财；“大忽隆”那些年，他的精神、劲头儿不少用在和队长、会计计较工分耍赖上……。总之，只要牵扯到个人的利益，他一点都不放过，为了这些事，他可没少跟人家吵嘴，时间长了，所以人们就给他送了“里迷疯”这个“雅号”。

再早的事就甭说了，只谈谈前几年“大忽隆”干活时的几个事吧。七六年那阵，他和社员一起参加田间劳动，他看到干活也没个定额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一样记工分，所以每天上工最晚，干起活来慢慢腾腾，马里马虎，两天干不了人家一天的活，人家还常要给他翻二遍工。可是，一到评工分时他可比谁都活跃，一开口就说：“我出身老贫农，凭这一条当然的该一等。要是给他评高了，大伙有意见。如果评少了，他连吵带闹没个完。因此，每次评分时，队长、会计总得迁就他。时间一长，社员们的意见可大了。队长、会计拿他没办法，后来就干脆让他去看山林兼管在山上喂生产队的猪。当时人们都说，这下可就把他治住了。谁知这样反而对他更有利了，他抓住山林人少离家远的机会，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来了。他在生产队的猪圈旁又垒起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猪圈，把自己家里的大老母猪赶到山上安了家。打那以后，他吃住在山上，几天不回一次家。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这回“里迷疯”可当真干了，谁知他却把百分之八十的心思都用自己的事上了。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山林上的树丢了四五百棵，生产队的五头猪喂得像削骨一样的瘦，而他自己的猪却喂得膘肥体圆，光下的小猪和开荒种的粮食就卖了三

百多元。这年年底，队干部到山上检查工作，终于露了马脚。队里开了批判会，撤了他的职，打那以后，“里迷疯”又回生产队参加田间劳动。

论说这回他可该接受教训了，可是谁知道他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。一次，生产队挖引水渠，根据大伙的意见，把任务按劳力分开干，人们说：“里迷疯”这一下可没咒念了。为了找一段难度小的干，开始他一连找队长换了三个地方。可是懒人偏遇不顺当，刚干了一天，他的工段就遇上了大石头，大伙都冲着他发笑，谁知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，跑到人家徐夫俊的工段上干了起来。等大伙都上了工，他早已挖了半米多深。徐夫俊气得和他理论，你听他说了些什么：“今天起的早，看不清，干错了。就这样吧，反正都是一样的活！”弄得人家哭笑不得。

“里迷疯”不择手段，沾光取巧，自私自利的事说也说不完。大、小队也经常开会对他的批评，可是一点也不解决问题。队干部对他没办法，群众都不愿搭理他。人们曾为他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：“‘里迷疯’徐光廷，大伙见他就头痛。便宜事儿最爱捡，只顾自己不顾公。”

我边走边想着“里迷疯”的那些事，不一会儿便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，我刚要迈进大门，忽然党支部书记庆岚二哥大声喊道：“庆黎大兄弟回来啦？”说着他便大步流星地朝我走了过来。我急忙迎上前去和他握手问好。

我把他让到家里，母亲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两盒精装前门香烟，妹妹忙着去泡茶。看到这些，我有些吃惊地问道：“咱乡下也舍得抽前门烟啦？”“怎么？抽前门烟还不舍得，不少人

家还经常抽带把儿的呢！”我母亲边向庆岚二哥让烟边说：“眼下咱农村和五年前你走时可不一样了。”“是啊！这几年咱这里变化确实不小！”庆岚二哥接着我母亲的话，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来：“你来时可能也看到了，五年间咱们村扩大了三分之一还多，大都盖的是新式房。你抽空到各家走走，现在家家都变了样，百分之九十的都有三大件（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），有不少人家还挂上了烟台大挂钟；吃喝更不在话下，一年到头基本上吃白面，喝酒都是瓶装的。生活在变，人也在变，就连‘里迷疯’……”“什么？‘里迷疯’大伯也变了吗？”我见他提起了“里迷疯”，没等他说完就忙插了这么一句。“也变了，变化还不小呢！如今他是大队治保主任兼义务护林员，干得满不错，去年还被评为全公社的模范治保主任哩！你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，大伙都说他和五年前相比完全变成了两个人，‘里迷疯’变成了‘利民风’”。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：“把这样一个铁疙瘩暖过来可真不容易啊！”接着，庆岚二哥便把“里迷疯”转变的一些情况给我讲了起来。

七九年前，“里迷疯”虽然有了某些转变，但总的来看变化并不大，真正对他触动大的还是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。八〇年，队上实行了大包干，田地按人口包到各家，一开始大队书记就在群众大会上宣布：各户收的粮食，交足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。除了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，今后不再向国家要救济粮。政策一公布，广大群众一致叫好，都说党可给咱定了一条富民政策。可是，唯独“里迷疯”却一言不发。据说当时他心里打着两个小算盘：一是对当时的政策不大相信；二是相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。由于有这两种思想作怪，所以地包下来后，他还是像过去“大

“忽隆”干活时那样：每天晚上工，早收工，到了地里磨洋工；好粪、化肥舍不得往责任田里上，水光往自留地里浇。结果那一年，他家包的八亩田总共打了一千多斤粮食，除了交公粮，留队里的储备粮，还剩下不足五百斤。可是，和他挨地边的邻居们，一般的每亩都收获了四、五百斤，除交足国家的，留下集体的，大都卖了“爱国粮”。有的还抽出一部分地，种了蔬菜、黄烟、中药……，当年的日子就来了个大翻身。在年终总结评比大会上，大队对粮食产量高、经济收入多，对国家贡献大的户，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表扬，还给卖粮五千斤以上和收入超千元的尖子户发了奖，上了光荣榜，同时，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不好好干的户。这样一来，他可傻了眼，一散会他就跑到大队办公室。当时大队正要留下大、小队干部和受表扬的社员开会，讨论明年生产的事，见他进来，都以为他又要耍赖，所以大家都憋着股气没吭声。谁知道他一进门就直拉着脑袋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过去沾光沾惯了，现在乍一包开干还以为没真的，所以这一年依旧没好好干，才落到这种地步……明年叫我一家五口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说着，他竟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。

大家一看“里迷疯”说得很诚恳，当时也就没再批评他。劝了几句就让他回家去了。

当天晚上，支书和三队队长去“里迷疯”家想找他谈谈心，一到大门口，就听得他家里像开了锅。“你光想沾光取巧，不但自己不好好干，也不让我们好好干，这回慢慢地有你难看的了！”“粮食多打点少打点倒关系不大，可是人有脸树有皮，跟着你当落后，我们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？”他们一听就知道是“里迷疯”

的爱人和大儿子在和他吵嘴，便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屋门。“里迷疯”的爱人和儿子见支书和队长来了，忙让座递烟，可是就是不见“里迷疯”的影子，他俩正要问，只见他从里屋耷拉着头走了出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上午他从大队办公室回来就钻进被窝蒙头大睡了，中午连饭都没吃。来的时候，他俩本想这次狠狠地批评他一顿，可是一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改变了主意，帮助他家开了个家庭会，启发他总结经验教训，鼓起勇气，从今以后好好干，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富起来，最后又把十五户受表扬的社员，主动要求每户支援他家一百斤粮食的事告诉了他。当时，他全家感动得都流了泪，“里迷疯”抓住支书的手一再表示：保证改邪归正，好好干！

听到这里，我高兴得再也忍不住了，忙问道：“这次他是不是真有点动心啦？”

看来庆岚二哥也谈高兴了，他提高了一下嗓门说：“这次他真的动心了。打那以后，他就一步一步地往高处走，没大出现什么反复。近两年来村里还传颂着他的不少佳话哩！”接着庆岚二哥就讲了徐大伯去年麦季帮助军属瑞英家抢收麦子的事。

去年麦收时的一天晚上，“里迷疯”大伯和爱人正边听广播边盘算着第二天一早收割自己家麦子的事，忽然听到广播里预报明天有暴风雨，这时他立刻想起和自家地挨边的瑞英的麦子也熟了。于是，他便暗暗改变了主意，打算先帮助瑞英家收割完再忙自己的。人心里有事睡不着觉，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还不到三点钟他就起床，叫上爱人和大儿子下了地。

鲁西南的初夏夜，天还是很凉的，早起来收割麦子总还要披上个小棉袄。可是这天“里迷疯”大伯就穿了两件单衣，他走起路来

格外带劲，把爱人和儿子拉了很远，三里多路不一会儿就到了。到了瑞英家的地边，他停也没停，挥起镰刀就蹭蹭地割了起来，不一会功夫就干出了十多米远。“唉！你这老糊涂怎么把人家瑞英家的割啦？”他正干的上劲的时候，听爱人喊了起来。“我早就知道是瑞英家的，先给她家割完再割咱的。”他边割边回答，连腰也没直。爱人和儿子弄明白之后，二话没说也和他一起干了起来……。

就这样，三个人一口气干到六点钟，等瑞英带着婆婆和十几岁的女儿赶来的时候，他们早已把三百麦子割完了，收拾得利利索索，感动的瑞英和婆婆不知说什么好。当天上午九点多钟，果然来了暴风雨，“里迷疯”家的六亩小麦有一半没割完，淋在了地里。

“真没想到他变化这么大！”听到这里，我和母亲几乎同时赞叹道。庆岚二哥也笑着说：“这几年他的变化确实大！可就是好吵嘴的脾气还没大改。”“听说他刚才还跟人家吵嘴呢。”我忙追问了这么一句。“他好吵嘴倒是真的，不过现在大多是为了正事。什么？今天他还跟人家吵嘴啦？在什么地方？干脆咱俩一块去瞧瞧！”庆岚二哥的话刚一落地，就听得院子里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不用去瞧了，我送上门来了！”说着“里迷疯”一步跨进了屋门。只见他披着一件崭新的黑色大羊皮袄，头上戴着一顶火车头帽；嘴里吸着一支过滤嘴的香烟。他的模样和五年前几乎没有多大变化，近六十岁的人了，不但不见老，反而显得比过去还精神。

“好了，咱省事了，就让‘里迷疯’大叔把刚才跟人家吵嘴

的事给你说说吧！”“里迷疯”大伯刚坐下，就被庆岚二哥将了一军。“你太不给面子了，人家庆黎刚回来你就抖我的老底。唉！说就说，反正丑媳妇不怕见婆婆。”他边开玩笑边讲起了刚才吵嘴的事。

“现在有的人就是光打个人的小算盘，今天早饭后，我从山林上转了一圈，回来想顺便瞧瞧小山岗上的树，没想到正好碰上一个小青年抡着斧子在砍树，我立时就急了眼，便放开喉咙喊了两声，他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大跳，只听得‘嚎’的一声就倒下了。我跑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徐光亮家的三孩子小夫秋。只见他脚上被斧子砍了个大口子，疼得他两手按着伤口直哭。我当时也没有顾得上管他这些事，就一个劲儿追问他为什么砍队里的树。他说要盖房还缺一根椽，是他父亲逼他来砍的。我刚要拉着他去找他父亲徐光亮，徐光亮就来帮儿子抬树来了，你们猜猜这老东西说了个什么？”他没等我们回答，接着又有声有色地说了起来。“他说，‘把我儿子的脚砍伤了，你要给养伤’。我一听这家伙不讲理，简直气炸了肺，我就……”这时，只见“里迷疯”大伯气得嘴光哆嗦说不出声来了。我忙给他倒了一杯茶。他喝了一口茶，稍微一停又想继续往下讲，这时他小孙子叫他去吃饭。“噢！天不旱了，咱们都该吃饭啦。庆岚你这当书记的可要主持点正义，夫秋砍树的事不能就这样算完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门。

我望着“里迷疯”大伯的后影，心里愈加激动，我深深地感到：家乡确实大变了，不只是生活变了，更可喜的是人变了。

## 一 张 照 片

黑龙江省学员 刘汉武

我家影集的扉页上，贴着一幅四人整身儿的合影照片，每当看到它时，都要引起我许多回忆。

这张照片是四十年代后期照的。四个人都戴八角单帽，身着二尺半大棉袄，打着裹腿，穿一双大头鞋。中间站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区委书记赵耀章同志，一个是他的爱人。区委组织委员李梅同志，两边是我们夫妇。

老赵是我走上革命征途的启蒙者。决策人，李梅同志又是我们姻缘的介绍人。然而，使我不能忘怀的却不止这些。

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，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。老赵领着我在三江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搞土改。当时，我才十四岁。是老赵到区完全小学把我们几个学生会干部抽出来参加土改的。说实在的，我只会说“革命”这个名词，究竟什么叫革命，怎么个革法？简直一窍不通。临离开家的时候，老人一再嘱咐：“就像学手艺当徒弟一样，眼勤一点，手勤一点，腿勤一点，苦差事多干点。”我信守着这几“点”跟老赵学着革命。

我们去的这个村子是全区二十多个自然屯中最大的一个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千数来口人。由于是煮“夹生饭”，老赵要亲自到这个屯蹲点。他一家一户走访，一个人一个人谈话，常常是通宵达旦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，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。可他的眼睛也熬红了，身体消瘦多了。

一天晚上，斗争恶霸地主崔大马棒。崔大马棒吊在梁杠上，呈×型。昔日那股作威作福、欺压人民的“英雄”劲儿一扫而光，今天现出了狗熊的本色。斗争会开得正热烈，突然外边传来了枪声，狗叫的也很厉害。不知谁声嘶力竭地在外屋喊了声：“不好了！来胡子啦！”会场一下子乱了，嘈杂声中灯也灭了。人们像炸营似的，靠门旁的人已经跑到院心。农会主任孙大楞喊道：“不要动！哪来的胡子？我去看一看。”人们还在叽叽喳喳。老赵站起来喊道：“不要动！”他的声音像一声巨雷，全场立即静了下来，静得连人喘气的声音都听得出来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同志们：情况很复杂。大楞同志的意见很对，他去转转，我们该当继续开会。”老村长点着了单灯，大家坐下来，继续揭发控诉崔大马棒的罪行。我的心却像十五个柳罐打水——七上八下地崩崩直跳，在嘀咕着：到底没来胡子？若是真来了不完了吗？老赵怎么还让继续开会呢？！

约略过两袋烟工夫，孙大楞和执勤民兵小王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还绑来两个人：一个叫张国栋，外号叫“歪脖张”；另一个是崔大马棒的小老婆，外号叫“大红梨”。会场上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孙主任。只听他说：“情况已经完全搞清楚了，根本没来胡子，是‘歪脖张’和‘大红梨’搞的鬼。‘歪脖张’喊来胡子是想把斗争会搞乱，混水摸鱼，把大马棒抢走。枪声是小王抓‘对’时，地主家窝子狗咬上来了，他打的枪。‘歪脖张’这小子是王二小放牛——不往好草上赶，大家说怎么办吧？”会场上立即像开锅似的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都要求斗张国栋。我想该斗！但老赵又站起来，目光环视全场一周，对大家说：“我说两句，看看行不行？斗争张国栋已在计划之中，今天他自己跳出来更好，我们把他先押起来，

今晚分别斗争崔大马棒和“大红梨”，让他们交待前天晚上那四胶皮车东西都拉那去啦？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。

晚间，躺到炕上，老赵让我谈谈对斗争会的看法。这已经是一个多月来的惯例了。不管多晚、多累、多困，休想躺到炕上就睡觉，总得把一天的工作让我说说。有时说对了，他高兴地赞扬两句；说错了，他耐心地纠正；说漏了，他郑重地补充。我深知这不单单是一天工作的回顾，更重要的是老革命对我这个毛孩子的培养锻炼。可是，今天却把我难住了。从学校抽出来学《土地法大纲》，到老赵讲“猴子变人”，到今天，屈指可数不过五十天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场面，从哪说起呢？想了半天，我把纳闷的问题提出来反问老赵：“你根据什么判断不会来胡子？又为什么不同意群众斗‘歪脖张’呢？你不是说发动群众不易，群众发动起来，只能因势利导，不能泼冷水吗？斗斗‘歪脖张’，让群众出出气，不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吗？”他听我这一连串的问号很高兴，先是说挺用脑子，接着便分析起来：“全县的大宗土匪如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黑子，已经被三五九旅消灭掉了，你没听说谢文东的脑瓜还在勃利（县）示众了吗！剩几个小喽子，一伙不过几个人。十几人，也都钻山兔道了。县大队正在山里剿匪。我们这村靠近国国防公路，离山较远，你想那几个胡子还没这村的民兵一半多，他敢来？！今晚不斗张国栋因为他不是主要矛盾，这小子坏，当过日伪勤劳勇士队长，打过很多人，民愤大，一撒手群众能把他斗死。可是崔大马棒拉走那四车东西还不知下落啊。夜长梦多，弄不好，整没了，群众分不到斗争果实，光图个痛快，到头来还

会挫伤积极性。”老赵说得条条是道，我也豁然开朗，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。我对他越发崇拜了，似乎把他看成“神仙”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。

事隔不久，区委决定让我兼管财粮。当时区干部中识字的人很少。全区二十来个干部，高小以上文化的只有五、六个人，还包括老赵和李梅。我虽然自己也信不过自己，觉得没把握，怕整乱了惹祸，但也不能推辞，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。谁料，没过一个月就差了五百万（东北币），这下子可坏啦。急的我连晚饭也没吃，偷着掉眼泪。不知谁把这件事报告给老赵了。他过来问：“怎么啦？不吃饭。”

“没什么，不饿。”

“眼睛怎么红了呢？”他追问。

我刷地一下子脸也热起来，心里犯嘀咕：前些天因为起草通知，写了扔，扔了又写，浪费些纸。已经挨了他的批评。什么“该当节约”，“该当检讨”，“该当这样，该当那样……”。“该当”，是他的口头语，区干部都怕他讲“该当”。因为一讲“该当”就要批评人了，批评的很严厉。今天差了五百万，说不上怎么批评，“该当”怎么处理？可是出乎意料，老赵不仅没有批评，反而像父兄那样宽慰我：年轻嘛！没干过，只要不把公家钱往自己兜里揣，就没事。甭着急，一会儿让李梅来帮你查查。”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，不批评比批评还难受。我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眼泪簌簌地流下来。这时李梅同志来了，她没等老赵开口，就批评老赵：“人家差帐就够恼火的了，你又来‘该当’什么？”

“我没‘该当’啊，你倒该当帮他找找”。